

《论语》中的隐性德育智慧探析

张彧^{1,2}, 陆卫明²

(1.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2.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论语》所体现的孔子重视教师身先示范、平等沟通, 倡导自我教育、推己及人, 全方位渗透之隐性德育智慧不仅对后世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对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论语》为视角分析其隐性德育智慧, 认为德育教育应尊重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 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应遵循德育规律, 做到情、理统一, 切勿急功近利; 注意发挥各要素的作用, 增强隐性德育的共育功能。

关键词:《论语》; 孔子; 隐性; 德育; 德育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6)01-0102-06

为增强德育实效性, 一些学者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和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杰克逊的“隐性课程”理论引入国内,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隐性德育的观点。他们认为目前德育中存在的灌输、教化思想已远远跟不上时代和受教育者的需要, 有时甚至会使其产生抵触心理。为改变这一现状, 德育中应重视隐性教育, 教育者通过运用各种载体, 将教育内容渗透到受教育者所处的环境、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中, 以较为隐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道德教育。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是有价值的, 但它绝非西方所独有, 也非凭空设想, 而是有其很深的文化根源。作为中华传统瑰宝之一的《论语》, 虽已风风雨雨经历2 500余年, 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隐性德育智慧, 值得教育工作者加以借鉴与弘扬。

一、身先示范、平等沟通的 隐性德育智慧

隐性德育的开展需要借助教育中的不同要素, 其中, 教师的作用不容小觑。教育者既是德育的承担者和发动者又是实施者和组织者。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人格素养都对受教育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论语》的诸多对话中, 我们清晰地发现, 孔子从不进行简单、教条的说教, 或以权威者的身份发布命令, 而是以协助者、对话者的姿态参与讨论, 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学识水平去感染学生, 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引领学生展开思考。

(一) 注重塑造教师的自身形象

孟子说:“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服也, 如七十

收稿日期: 2015-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K034);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B12004S); 福州大学社会科学科研扶持基金项目(14SKF79)

作者简介: 张彧(1979-), 女, 陕西西安人, 福州大学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子之服孔子也。”这句话是对孔子人格感染力的真实写照。孔子虽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以”,也自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他始终把完美人格作为自己的一种终极理想,一种人生向往和期盼。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老师,孔子还非常注重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他自谓“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都说明孔子从不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认为自己的成就只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并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应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学问,每个人的知识永远有限,只有不断积累,才能永恒前进。正是具备这样的谦逊品质,孔子一生“博学于文”,广泛涉猎各方面的文献、典籍,最终成为“万世师表”。子贡评价道:“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对其师孔子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就连孔子多次赞美的贤者颜回,也都“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些都是学生对老师的最高赞叹和发自内心的忠挚感情。正是在孔子如此风貌品德的示范与感染下,学生们才不断追赶。由此可见,教师为人师表的隐性德育作用非比寻常。

(二) 注重亲身体验,不言之教

孔子一生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做人准则。在《论语》中,他多次反对“佞”、“巧言”,而欣赏“木讷”,表现出孔子“行为优于语言”的思想。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矣。”这与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的“不是太初有字,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超出语言的东西并非“字、力、心”,而是人的“为与行”。这些观点同孔子德育过程中所倡导的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轻言重行原则不谋而合。具体体现为:在教育学生中,孔子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自己就“子入太庙,每事问”;在教导学生需学思并重时,则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面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时,以自己为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得知“朋友死,无所归”时,则提

出“于我殡”;即使身处危难“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时,孔子仍展现出自己持之以恒、安贫乐道的君子品行,强调“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诸如此类,不由得令人心生钦佩、赞叹不已!

(三) 注重平等对话,把握时机启发引导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中带有明显的主观思维模式,他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并非将主客体明显区分,形成对立审视的关系,而是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参照,共同认识。这一思想自然也体现在德育过程中。《论语》中记载的大量事例足以表明孔子与弟子不是主体与客体、上与下、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亦师亦友、交流共进的关系,往往在双方轻松对话中完成“传道、授业、解惑”之任务。一次,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上述对话看似平淡、随意,却蕴藏了孔子德育的技巧性和艺术性,对今日之德育不无裨益。

第一,对话中充满真诚。真诚是良好沟通的基础,没有双方坦诚相待,以心换心很难使对方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进行深入沟通。而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则是真诚沟通的典范,师生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互换,这样才能擦出火花,产生思想共鸣。第二,无意识的学习体会。与弟子谈“志”,孔子并没有选择在课堂上“以我为中心”,摆出权威的姿态,强行将自己的认识灌输给学生,而选择与学生闲谈时,各抒己见,在互相启发中体味其中奥妙,使弟子在毫无察觉中接受自己的观点。第三,实现更高层次的引导。对话中,孔子没有先于弟子说出自己的志向,以免干扰他们的想法。而采用了先倾听,后引导的方式。一身侠气的子路,胸襟十分开阔,愿与所有认识他的人分享荣华富贵,大有杜甫诗句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抱负。而自我修养很高的颜渊将“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彰自己的功劳”作为其志向。随后,孔子才在子路的发问中说出自己的答案。无疑,孔子的志向远远高于学生,是对社会大同理想的构建。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带入更高层次,激发起他们学习的无限动力。

除此之外,孔子还特别善于创造机会、捕捉时机对学生进行指导。一方面,他支持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在学中问、在问中学,认为只有学生发现问题,并

对解决这一问题产生兴趣时,才是对其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正如孔子所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另一方面,他不主张将答案和盘托出,而让学生自行总结归纳。如《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然而他从不直接明了的把“道”讲出,而是让学生耐心品味,找寻其中的真谛。

作为教育者的孔子自始至终没有以讲经说法的方式把道德理论系统性地传授给学生,但他这种为人师表、躬身示范、真诚沟通的教育方法,恰恰是在不经意的对话、无形的模仿、无意识的体会中使学生学到了最真实的知识和最受用的理论,由此体现出教师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二、倡导自我教育、推己及人的隐性德育智慧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朱子集注》中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张敬夫曰:“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知之、好之、乐之”作为3个交相对映的心理层次,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作用和本体感悟。同样,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实为“乐感文化”,它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与天地参”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这种主体性精神与孔子的德育思想密不可分。在孔子之前,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源于宗教性的服从,对鬼神的敬畏。而孔子一改往日传统思维,“明确提出重人道轻天道的观点,认为人比鬼神重要,肯定人的地位、突出人的作用、承认人的价值”^[1]。他强调道德规范来自于人的自我需要和自由选择,并非某种神秘力量的外在影响,因此,德育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

(一) 重视培养学生自主性和自觉性

隐性德育的顺利实施有赖于“显”、“隐”两方面的有效配合。其中,“显”指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隐”指隐藏教育者的教育目的和意图。孔子深谙这一教育规律,提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认为在人的道德品格形成过程中,“己”是内因,起决定作用,“人”是外因,起辅助作用,而“仁”的实现要靠内在的主观意志,绝非外力强迫所能奏效。正因为此,孔子倡导内省、改过的自我修养方法,主张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君子首先要“求诸

己”,从自身找原因。当犯了错误,则要正视自己的过失,做到“过,则勿惮改”。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学习是一个人获得道德知识、前人经验、进行道德修养的条件和基础,而对所学内容的思考和言行的自我检查是主体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升华,因此要“学思结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上这种重视修心育德的思想就是要唤起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性的道德自我。

(二) 重视换位思考、能近取譬方法的培养

孔子重视主体性的思想除了体现在内省,自我检讨的培养方式外,还体现在重视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教育方法中。一次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而当子夏问“孝”时,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上下两章,“不敬”与“色难”先后呼应,都道明了“孝”的根本不在于物质上的满足,更在于精神上的享受。作为子女要站在父母角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才是“孝”的真谛。推而广之,圣人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想得到的,就帮助别人也得到;自己想开拓发展的,就帮助别人开拓发展;替别人着想,关心、关注他人,将心比心才能成为君子,才能实现“至仁”的理想。由此我们看到,孔子在培养主体“尽己”的基础上,已将“推己及人”作为主体道德完善,实现超越的最高目标。

(三) 重视道德需要,体现人文关怀

道德需要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心理学研究表明,道德需要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源泉。人的道德行为总是指向一定道德需要的满足,从而获得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2]。翻开《论语》,从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做人的道理到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孔子不仅构建起自己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还满足了学生居家、交友、做事等方面的道德需要,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他坚信:“不学礼,无以立。”“礼”作为一种涵盖面极广的行为规范,是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必备常识。因此,对于小学生,孔子认为应教给他们洒水扫地、迎接客人、问候长者以及如何在别人家里做客等基础礼节,培养他们养成勤劳、恭敬、孝顺等良好品质。而对于大学生,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应教会他们为人、处世、竞技。孔子之道总是从实际入手、从具

体言行入手,很少涉及“什么是”等哲学命题的探讨,而重视“如何做”等经验性方法的教授,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实用理性”的原因。

此外,答疑解惑中即便面对同一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的解答也时有不同。比如:子路、冉有问曰:“闻斯行诸?”对于子路,由于他勇敢爽直,做事有时不免轻率、鲁莽,所以孔子答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面对个性谦退,遇事往往畏缩的冉有,孔子鼓励他不要犹豫:“闻斯行之。”这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众弟子问仁、问政、问礼、问孝等均因个体差异而给予不同回答^[3]。他熟知每位学生的个体独特性,为避免他们犯过与不及的毛病,教育中他从不只空谈心性,而是结合具体心性来施教,从而达到满足个体不同的道德需要,真正触动学生心灵的目的。

三、全方位渗透的隐性德育智慧

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教育信息,能为教育者所运用,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它在隐性德育中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孔子十分善于运用教育载体,在他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的出现,但他巧妙地将德育内容融会于榜样、政治和礼仪教育中,赋予他们德育之精神。

(一) 寓德于贤,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寓德于贤是孔子独特的一种德育方法。在他之后,历朝历代都通过奖励孝子、忠臣、廉吏、义妇等来宣明教化,树德示众。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赞叹尧、舜、禹等上古时期的圣贤先哲,用以激发弟子们的崇敬、学习之情。诸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非但如此,孔子还视周公为榜样,推崇备至,甚至对弟子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足见孔子这一复古论者,尤其赞赏古人的品行才德,淳朴人心,并希望弟子们予以仿效。尽管他在字里行间有美化氏族民主、美化周公之嫌,但此种德育方法至今仍尤为可取。根据现代教育理论,榜样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情理交融的体验性教育活动。在教育过程中,树立恰当的榜样形象能引起受教育者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诱发他们崇敬、认同、信服和效仿学习的内心体验和主观愿望,以使受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中产生模仿和学习

榜样者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模仿是主体发自内心的,自愿、主动的而非强制性的,还往往伴随愉悦的情绪体验。二千多年前的孔子虽没有提出这一教育方法的理论概念,但他在教育中娴熟运用了此法,在看似不经意的赞美期许中,对学生产生暗示效应,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教育效果。

(二) 寓德于政,政教合一的教育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天下无道,礼乐不兴,诸子百家纷纷建言立说,以重建社会新秩序为己任。他们秉承道德为政治之基础的理念,力求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实现社会秩序由乱到稳、由无序到有序的目的。孔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受氏族社会血缘关系为政治之基石的影响,孔子的政治观总是与仁、德紧密联系,坚持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论语》中孔子答人“问政”的事例颇丰,类如“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虽然孔子答复各异,但都将“政者正也”的思想贯穿其中。他深信:“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表面来理解,这里的“正”是指对行为的规范,“政者正也”即是说政治的本质就是管理、规范社会的行为,符合春秋时卿大夫的一般观点。但孔子对这句话的含义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在他看来,“正”是指执政者自身之正,执政者德行之正,正身是对执政者而言。只有他们发挥道德示范作用,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才能促进和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宁有序,才能实现民正。孔子巧妙地将政治规范与道德德行结合起来,在品评时政中探讨政治得失的道德根源,又在德育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既强调了社会规范、政治秩序的作用,又凸显了从天子到士大夫个人修为的表率作用,寓德于政,建立起了道德与政治的根本关联。恰如杨伯峻评价所言:“孔子的政治主张便在于以道德力量来感化人民,这样便可以不用繁刑重罚而使人民自然归服。”^[4]

(三) 寓德于礼,追求人格完善

“仁”在孔子德育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人内在德性之根本,需要不断追求、不断实践才能达到。《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说有多处,“爱人”应是最具代表性,最能概括孔子思想的回答。但这一解释对于实用理性极强的孔学思想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未免过于抽象,让人难以琢磨。因此,孔子提出

“克己复礼为仁”,用这种方法将内在的人性境界、内心欲求与外在的实践礼制和社会规范有机统一起来。以此为目的,孔子将“仁、德”思想融入到一系列的礼仪规范中。在个人修养方面,他认为个体是在不断践行“礼”的过程中启发道德自觉、塑造完美品格,所以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只有在日常行为处事中合乎规范,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家庭生活中,当宰予提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时,孔子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这里孔子将“礼”建立在情感原则“心安”上,用外在的礼制反映亲子关系的核心:“孝”和“慈”。这样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原本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道德伦理规范与人的内在心理欲求融为一体^[5]。这种理情互通的教育方法不但避免了“礼”的形式化、虚假化与仪式化,赋予“礼”以生命和内涵。同时,也在遵守礼仪规范中不知不觉地培养了人的仁爱、恭敬、诚敬之心,明确了各自的社会责任,从而建立起稳固的道德秩序。可见,孔子的“礼”学说,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必须有其“仁”学说才能成立。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正道出了孔子之礼,不可以无仁^[6]。

四、《论语》中隐性德育智慧的当代启示

古人云“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部不朽之作,它的文化价值难以估量,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论语》中的隐性德育思想丰富而深刻,虽历经千年沧桑,但却蕴藏着跨时代的合理因素和智慧魅力,为当今德育工作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 尊重并借鉴中国传统德育思想,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隐性德育方法的实施在孔子仁学思想的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厚德、睿智、宽容、普世的人生导师,孔子“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其仁爱思想以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发展人为基本诉求,充分肯定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进而提出了“泛爱众”的道德命题^[7]。他在教书育人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归纳出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德育理念和方法,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德育资源。不仅

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括很多优秀的德育思想,如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墨子“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的思想都对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人格气度以及思维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基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在当今德育改革进程中,面对德育实效性不佳的事实,一些学者忽视甚至无视中国传统的德育文化,一味地寻求西方的灵丹妙药。每当谈到传统德育时,无论是否了解其实质内涵,就大加批判,完全否定。还有些学者为表明自身研究的先进性和前沿性,“唯西方为中心”,大谈杜威、科尔伯格理论的优越性,未经反思地就要把别人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德育之中。殊不知任何一个德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文化沃土,如果未经改造就使用一个舶来品,必将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难以开展的后果。况且,中国的传统德育思想绝不落后,而是闪现着耀眼的普世之光。就如西方隐性德育中重视环境育人的思想,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被世人所认可。所谓“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中国古时学府大多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从宋代勃兴的四大书院到明代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再到清华园的“荷塘月色”,无不体现着人文关怀与独特的精神气质。诚然,在《论语》等传统德育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消极认识,但仍掩盖不住其绚烂的色彩。水必有源、木必有本,历史和传统是每个国家难以改变的“精神基因”,当今德育应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只有我们正视传统德育思想,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换,才能避免走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德育之路。

(二) 应遵循德育规律,做到情、理统一,切勿急功近利

道德教育的成功是靠“养成”而非“速成”,此乃德育之基本规律,隐性德育也不例外。《论语》中孔子就遵循此道,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总是“以柔克刚”,从不硬性强求。他把学生品德的形成看成是一种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制定教育目标中,他注意目标的层次性,使不同阶段的学生都有所追求、有所顾盼,致使大家不断向善,在教师的循循善诱中逐渐实现自身的人格完善。他还非常注重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面对问题总不急于公布答案,而是给大家以自由

发挥的空间,启发道德思考。并鼓励学生在饮食起居、日常洒扫中养成自己的道德习惯。除此之外,在德育过程中,道德情感等心理因素还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只有“情通”才能“理达”。《论语》中孔子极其重视以“仁爱”、“亲情”为基础的情感作用。检视孔子对“仁”的论述不难看出,他对“仁”的许多解释均从人的心理角度立意,并结合人的血缘、亲情、意志力等基本的生活因素,从而使其德育思想充满了心理感染力^[8]。当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强调了内在情感对“礼”的支撑。反观我们现在的德育,陷入了一个只注重外在道德要求,忽略内在情感需要的误区,过于看重道德知识的掌握,导致德育“无情”和“空心”。然而,道德理性固然重要,但并非道德养成的全部。德育本质上是个人内在道德情感与外在社会规范的对话,缺乏情感的教育只能导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因此,教育者应遵循道德规律,倾听受教育者的心理诉求,激发他们的道德渴望与道德情感,帮助其实现由内而外的道德转换。

(三)教育过程中应注意发挥各要素的作用,增强隐性德育的共育功能

隐性德育是一种全方位、开放性的教育,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生活中的各种德育资源都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受教育者施加全面而综合的影响。《论语》中孔子借人育德、借物育德、借事育德的事例就证明了此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德育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重视课堂中的理论灌输,缺乏身边载体的发掘和利用。比如孔子大力提倡的音乐教育,就处于非常式微的状态。很多学校一再压缩音乐课的课时,或根本不开设此课。学生很难通过高雅音乐中的舒缓旋律来净化心灵、释放压力,更难以通过词中美文佳句来陶冶情操、提升文化修养。而受到学生追捧和传唱的网络音乐,又难当此重任,甚至作用相反,使得德育与音乐的关系渐行渐远。此外,作为隐性德育的另一主阵地,家庭教育的无力也助长了学生不良品格的形成。父母是子女的楷模,其一言一行都对子女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养不教父之过”的典故,格外重视父母亲身示范,以身作则的作用。而《颜氏家训》中则更为具体地指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

义则妇不顺矣”。将“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表露无遗。然而今日之一些父母自身就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惯,有的视金钱如上帝,有的铺张浪费、大肆挥霍,更有甚者出现行贿受贿,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他们的思想言行又怎能不对子女产生深刻影响,又怎能不令人痛心与反思!因此,德育工作中需重视载体的运用,充分挖掘身边事物的德育载体价值,不断开发新的物质、精神和制度3个方面的隐性德育资源。以优美的物质环境向学生展现博大、厚重的德育文化,以优雅、端庄、自信、严谨的教师形象向他们传递正能量,使学生在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中自觉地养成与巩固良好的道德习惯,以帮助其达到人生真善美的和谐境界!

五、结语

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论语》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了孔子极为丰富的德育理论和具体实践。这些思想博大精深,不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累积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并学习的宝贵财富。因此,分析并研究孔子隐性德育思想,汲取其合理成分,对推进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品质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任民.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再认识[J]. 学术交流, 2001(6): 31-35.
- [2] 陈利民. 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6(5): 42-44, 49.
- [3] 朱哲, 鹿丽萍. 有教无类, 立德树人——孔子教育思想的伦理意蕴[J]. 伦理学研究, 2009(5): 75-80.
-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6] 刘家和.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5.
- [7] 韩延明, 李文婷. 探析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和谐社会理念[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4): 76-82.
- [8] 史磊. 传统与创新: 孔子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与精神蕴涵[J]. 理论学刊, 2006(9): 102-104.

(下转第113页)